

附件六

「海市蜃樓」計畫——姚瑞中老師訪談

「藝術的重點不是在求取像數學般的解答，不是！它的重點在於在這個答案之外，還有什麼？」（姚瑞中）

程少鴻訪問、整理 2013/1/14

程少鴻（以下簡稱程）：談談《海市蜃樓III》的內容

姚瑞中（以下簡稱姚）：其實原本打算每年做一本，看看能做幾本，但因為二女兒在2012年出生，變得比較忙，所以就先暫停了。這本延續之前的概念，還是做比較客觀的報導和記錄，主要是先前漏掉的一些案例，大約有100個。政府機關有很多資訊都是不公開的，要找出這種不透明的資料是比較困難的事情，尤其是短期內就將資訊公開化的挑戰，其實有點像「維基解密」的概念——調查一些政府害怕人民知道的訊息並公佈以後，它本身就會產生輿論壓力，公部門內部勢必進行檢討，所以基本上，我們這個計畫是不碰觸實際執行層面，不給予太多的介入。重點是透過攝影的紀錄功能，以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——比較偏向社會觀察者。它所引起的漣漪跟效應是整個社會必須要共同面對的，也就是當這個資料被公佈之後，社會要採取什麼方式去回應它？政府要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？

書中的文章都比較中性一點，裡面沒有太多激烈批判、沒有過度建言。我們就是拋磚引玉，讓社會形成一個討論，因為開放的討論是更為重要的。這個計畫的重點其實不在於批判——像社會運動的組織或個人去進行批判——而是屬於比較軟性的抗爭。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目的，另一個目的就是紀錄社會變遷的樣貌。這種類型學紀錄就變成一個客觀文獻，可能對於未來10年、20年後的年輕人來說，能夠獲得一些了解台灣社會發展脈絡的切入點。此外，這個計畫的重點還包括學生的參與：他們回家鄉去普查的過程。現在的資訊都很發達，但是學生較為缺乏的是以較宏觀的角度與視野，去看當代問題背後運作的核心。所以當他們個別去拍之後，我們上課會一直不斷討論，每個同學每週都會交出幾個案例，透過交叉討論跟現象觀察，慢慢形成思考權力運作痕跡的反思。

程：藝術學院的教育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是否有幫助？

姚：這個計畫基本上批評了三個面向：比較顯著的就是社會議題的軟性批判。當這種圖鑑式的書只集合一、兩個案例的時候，其實是沒有什麼力量的。它必須集結出完整而普遍客觀的案例

才會產生力量；必須達到一定數量才能佐證這其實不是單一案例，而是社會共謀下的產物。

第二個要去談論的是所謂「藝術教育」。我們在課堂所學的藝術教育以及美感教育，是不是對於現實的某些現象沒有客觀審美的條件？比如說，這些學生可能被老師要求在畫室裡畫石膏像、畫水彩、臨摹古代西洋大師的技法或是作品，可是對於自己的環境，基本上卻是比較冷漠、冷感的。我特別希望同學回到他們的家鄉，分批分段去進行；我希望他們走出工作室，去跟更多的現實面接觸。當然，這只是一個出發點，因為社會的問題很多，蚊子館只不過是當代台灣社會中比較中型的問題，還不算主要問題。經過這些磨練，有些同學就會比較了解社會運動跟抗爭背後的原因，也有些同學會繼續參加一些社會運動或協助弱勢，其實都有一些案例。

第三點是對於「攝影本身的批判」。因為參與的同學有很多不是美術系，有些是國文系、社會系、英文系、化學系、物理系等等。許多同學對於攝影本身的認知就比較狹隘，他們認為攝影可能就是一個娛樂，或只是一個記錄；對於是否能夠對現實生活產生一些力量，其實並不清楚，而且對於攝影的認識比較沒有那麼深刻。一般年輕人就是拿著手機或是一台傻瓜相機，拍拍這樣——「YA！」就OK了！或是去拍一些美麗的風景。

我覺得，透過攝影這件事情是要訓練他們觀察事情的角度，而不只是學會那些技術而已。因為現在的技術只要一隻手指頭就可以搞定，那就是在壓下快門的時候——是什麼讓你壓下快門的？是美嗎？還是它背後的某個東西？你想把背後的那個東西揭露出來？或者想要去探索背後的真實才壓下這個快門？因為它是表象：物體表象背後都一定有權力的運作結構！所以必須透過實地、親身的在那個場域感受之後，然後壓下快門。透過他們的眼光觀察，分享他們所看到的臨場感。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，要求各個細節都要拍；有些地方可能要去好幾次，還要明查暗訪。因為同學們不是記者、也不是立法委員。他們沒有這種權力，所以必須要用比較平等的方式跟被訪者進行互動。他們可能去問看守者，跟他聊天，或者去問當地里民的意見、去問附近鄰居的看法。彙整出的這些文字，會比較貼近一般民眾普遍真實的感受——這點我覺得他們有去嘗試。因為這些學生都比較單純，所以我希望能夠讓他們在進入社會之前，或是在出國留學之前，可以先透過這個計畫進行社會意識的開發。

其實一個班級就是社會的縮影。比如說有一百個同學好了：非常熱心投入的就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，百分之五十的人就是交差、交作業，百分之十的人可能就是那種覺得老師在剝削他們的這種學生（笑），剩下的就是來打混摸魚的。但是也無所謂，因為不可能全部都是那麼積極的。我後來也體驗到，只要是運動型的計畫都會有這種結構性的問題。所以，我自己也學得滿多的。

程：學得滿多的，是指學生給您的反應跟回饋嗎？

姚：這是一部分。還有一部分就是可以相對看清社會背後很多複雜的問題——像城鄉差距問題、開發主義的迷思，或者說地方樁腳與工程之間的掛勾……都有。我後來都比較瞭解了，同學他們也慢慢瞭解了。其實還滿有收獲的！

程：您說計畫一年出一本，這個計畫在第三本之後，還會有繼續發展下去的打算嗎？

姚：這要看政府而定，因為它其實是相對性的！如果沒有蚊子館，我們當然就沒有辦法拍了。所以還是看政府消滅蚊子館的速度有多快，我們這個計畫就會有多慢。過去一年，政府其實也消滅滿多的，但其實還有更多，而且還在製造當中。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對這個社會脈動留下一些紀錄，給執政者留下一些圖鑑，讓他們自己去反思一下。

程：您的計畫帶動了許多學生的參與。就您的觀察，這個世代的批判與抗爭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？

姚：當然因為通路的改變，它造成了很多串連行為的改變。以前只有電話或是B.B.CALL，沒有手機或是E-mail。那個年代的抗爭行為跟現在比較不一樣。現在的話，因為有了Facebook，橫向串連的工具非常發達，所以短時間動員起來的速度可以非常高，但是不是真的能夠具體改變，我覺得還不一定。因為它會慢慢落入一個奇怪的邏輯，比如說樂生的抗爭事件：它其實抗爭十幾年了，串聯的也夠多人了，整個效應很廣，但歷經那麼多任政府首長還是沒解決。所以你說這種運動有沒有效？它當然是有效的，可是對於政府責任的核心價值是不是有所改變？我覺得很難講。上街頭是一種方式，做研究計畫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覺得可以透過一種比較訴諸情感，或者比較不那麼硬碰硬的方式去跟政府對話，或許會比較有效。

其實我們也沒做什麼，就是把書出版後寄給這些行政長官，他們自己看了也知道問題的嚴重

性。我們採取的方式是用一種……就是說你要監督政府機關，某個對象的話，你要知道它是吃哪一套的。比如說政府都一定有一套程序——就是實本公文以及事實根據跟數據，這對它們來講是最有效的；若如果沒辦法提供這些東西的話，對他們來講就是無效，比如說你發E-mail去抗議，你抗議第一次它可能會反應，可是當你一百次、一千次以後它根本就無感了，會覺得你根本就是來亂的，因為你沒有提供數據、證據、公文或是紙本的東西，他們就不會太重視。電子訊息的好處就是它快速，但會讓人覺得太簡單了！簡單到他們覺得你自己都不重視這個訊息，他為什麼要重視？比如說，你發一個E-mail到總統府信箱，簡單到大家都覺得太簡單了！可是如果你寄了一本那麼厚的書到總統府去，跟寄一封E-mail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他們會認為這是很正經、很重要、很有份量的事情，必須要去回應，而且要知道，打要害只能打一次！如果像蚊子這樣亂叮的話是沒有用的，有關單位只會噴很多防蚊液來防堵。各有利弊啦！我們採取公務員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做，因為書裡面並沒有指責基層公務員，只是把不合理的現象提出來，讓他們知道不合理之處。至於改善的方式，就要想一想，是不是先找幾個重要案例來改善？按重要性與可行性循序漸進活化。

程：您覺得這個計畫由您以及藝術背景同學來進行，和由其他專業背景的人，例如新聞背景、法律背景……他們來做的差異為何？

姚：其實這個計畫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做；不管是藝術背景還是醫學背景，或者是海洋研究、科學背景……我覺得都可以做！因為每個專業有不同的觀點。美術系屬於比較視覺思考的動物，所以同學們對視覺性比較敏感，他們比較可以就空間以及周遭環境，或是從材質去發揮，所以他們拍出來的照片都滿有臨場感與空間感的，加上比較軟性的文字。我當然會去過濾他們的文章是不是有過度謾罵、情緒性字眼，或是引用數據不正確……我全部都會查過一次。為了防止學生被告，這方面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確認。這點我覺得不管是搞攝影的也好，還是搞什麼的……重點不是他的專業背景是什麼，而是說他對於社會發展，可以從專業的角度去回饋什麼？那剛好我在教書，我也拍了很多廢墟，所以有這個機緣去拍。我覺得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！社會上還有很多題材正在發生，需要投入專業的看法，因為政府施政的思維跟技術官僚的看法基本上是比較窄的，比較沒有用太寬容的格局去看。所以，我們反而提供了他們一個從學習造型藝術的學生的角度，去看政府蓋出來的一些建築的看法。

程：您之前談到《海市蜃樓》處理的還只能算是社會中一個中型問題，那主要的問題是什麼？

姚：當前台灣有十大問題必須要改革。這個問題依照輕重緩急的話呢——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問題，其中當然包括了核安問題：核四廠，還有核一、核二、核三本身的問題，或核廢料儲存槽外漏的問題，其實都很嚴重，但政府都一直不回應，透明度過低。這其實很重要，因為

只要核安出問題的話，幾輩子的奮鬥就毀了！大家就只能逃亡吧！就會變得像宋澤萊《廢墟台灣》^{註1}的描述那樣。第二個問題，就是土地正義的問題：土地正義包括了財團與政府的圈地運動，像之前大埔農田被市府強行徵收^{註2}，還有很多類似的土地倫理問題。這現在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：財團圈地，然後炒高樓價，製造了一百多萬戶的空屋率，所以現在有很多死城，像淡海新市鎮那邊的居住率很低、空屋率很高。這種大型建案、集合式住宅，是過度開發與炒作土地，對人民其實都不好。

第三個，像都市更新也是滿嚴重的問題。都市是必須要更新的，但是都更條例在某個程度上來講有違憲疑慮，它更新的方式跟導向，全部都導向財閥，讓一般老百姓只能被驅逐出他們辛苦經營的家園，也沒有獲得充分尊重。建商為了要獲得高昂利益，所以用了很多手段去遊說立法院，然後進行條例的修正——從某方面來說，政府反而變成了打手。

另外還有高等教育也是問題。教育問題不只是大學浮濫，還有十二年國教……它當然跟少子化也有關。台灣大學的入學率破百分之百，已經浮濫得很嚴重：全台灣的大學有150幾座，但大學卻掏空了原本技職教育這個部分，以前還有五專、三專這種比較偏技術教育的；但現在台灣的大學幾乎偏向白領階級、學術研究導向，實務層面被抹煞了。此外，大學生素質被稀釋，導致大學生有一種高中化的走向，研究生則有大學化的傾向。越來越多人對高等教育沒有什麼信心。大家寧願送小孩子出國，人才就跑光了。

再來就是人才外流的問題。我們剛剛有說過，因為居住不正義、土地沒倫理、教育浮濫、企業外流。很多人才就跟著出走，競爭力就降低了。像勞動階層不足，所以引進外籍勞工。像我剛剛說的其他問題，還有包括像外籍勞工和外配問題。所有的東西其實都綁在一起的。

還有農地休耕問題：台灣農產品很多都是仰賴進口。台灣大概一半的農田是休耕的。休耕之後，很多老農民領政府補助、老人津貼或是農地補償，休耕反而可以賺錢，進口的東西反而更便宜。這樣一來，很多農地休耕怎麼辦？農民就賣給都市來的人改建高級農舍；很多鄉村豪宅別墅出現——但他們其實就是假農民。農地政策又跟工業開發有關，像是最近中科四期的搶水問題，就是因為農地跟科技發展之間的失衡。還有很多其他問題，比如勞健保問題也可能破產，跟醫療系統也是息息相關。還有萬萬稅的制度問題、司法及人權問題等等。

之所以說蚊子館算是比較中型的問題，因為它還不是最急迫性的。它是一個長期以來，藉由開發主義導向，弭平城鄉差距的一種手法。但是它中間還有很多利益回扣跟選票的回饋系統，比

如說，我要選市長、選市民代表，我要呼口號：「我要建設×××，我要蓋一個台中塔！」這就是選舉支票。蓋台中塔要幹嘛？難道東京有天空之樹，所以台中也應該有嗎？這個問題會變成一個盲目追求國際化的迷思！所以政府往往提出很多橫向移植過來的外部思考。這種開發主義有時候是一頭怪獸，若無法駕馭這頭不斷擴張的猛獸，它會回過頭來吞噬掉當地一些純真的東西。比如說大型觀光產業開發案在東部肆虐：像美麗灣就是屬於東部開發條例首當其衝的第一個案例。因為如果這個案例一通過的話，東海岸的十幾個大型海岸開發案全部會被通過，這麼一來，整個花東就會峇里島化，當地人可能變成服務連鎖國際大飯店的幫傭。天然資源變成了私人財團的資產，這是有問題的。甚至像離島馬祖變成賭場。整個台灣都瀰漫在一個「以為透過大型開發案就可以帶動地方繁榮」這樣的思維之下，可是如果開發失敗呢？誰負責？不管是他們的生活習慣、他們的傳統信仰、他們的生活方式都會有很巨大的改變。在這之前，有沒有做過評估？在財閥眼中只有利益！政府只要求數字、量化：好看的經濟成長率是選票的保障。其實本計畫有時也是會碰到這塊！因為很多大型開發案失敗後就變成蚊子園區或是蚊子館，都跟這個思維有關。所以蚊子館正好反映了開發主義思維下的失敗產物；還有假民粹主義下的產物。什麼叫假民粹？就是很多的競選者說要服務鄉民，他其實是動員那些民粹去壯大聲勢，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在為民服務，只是要換取那個權力罷了。

那當然我們這幾本書有一個紅線沒有去踩。我們是故意不踩的，因為我怕讓那些學生被抓去關，或是黑道會來干預，所以我們就沒有寫出誰是開發商、誰是執行者、還有誰是建築師、規劃師。這些我們都把它拉掉，如果真的要查的話，就會發現背後的圖標、黑金、還有政商關係、背後利益是很龐大的，監察院才該針對這部分全盤調查。

程：您講的以上幾個問題，其實都與政府的政策實施有關。

姚：台灣政府的思維模式，從1949年以來其實都差不多。首先，它有一種焦慮感，是來自對岸的競爭關係，這種關係從歷史上分析的話，比如說1960年代大陸有文化大革命，台灣就有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的新文化運動。1980年代經濟起飛，加工進出口特區開始成立，密集勞工跟傳統工廠大量興起——中產階級開始崛起——它就被樣板化變成一種民主象徵。又例如台灣最近為什麼要辦聽障奧運？因為北京辦了奧運！台北當局向來都希望跟北京平起平坐的，但礙於國際現實只能辦聽障奧運。政府很多思維是潛在性地跟大陸競爭。那為什麼台北要搞花博？因為當時上海有博覽會。但結果是二個大城市在慶典後都留下了一堆蚊子館。這種潛在性的兩岸競爭其實一直都存在，例如兩岸的軍備競賽，這個背後更深刻的因素在於：台灣自認是中華正統優秀文化的傳承者，包括故宮國寶、漢字、儒學，或是所謂的正統中國的代表者。

因為台灣一直不被視為一個正常的國家，長期處於例外的狀態，所以自卑情結會讓我們從其他方式去參與國際社會，達成我們所謂的國際化標準，不管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，我們都是「就是要」！為什麼？因為這樣才能顯現一個國家的高度，可是事實上是沒有的。它一直沒有能力去處理外交問題，而是從內需問題去處理這樣的自卑感。所以為什麼有台北101？一樣的道理！因為他們要台灣被看見。台灣被看見有那麼重要嗎？台灣為什麼要被看見？因為台灣一直被中國壓得看不見。為了要讓世界看得見，就必須要追求亞洲第一、世界第一，才有可能被看見！那中國有這個焦慮嗎？中國比較沒有，因為中國不管怎樣都會被看見，而中國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看到台灣，它覺得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而已，所以台灣的焦慮就更深了。

除了政策的部分，還有因為台灣以前一直都是世界加工廠。可是後來全部都轉移到大陸或東南亞去了。台灣的後盾其實就是美國，美國很多思維跟價值觀深深影響著台灣；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推動者，所以台灣也會朝這個方向去發展，可是這中間碰到很多問題更加複雜：之前說的很多台灣大問題，現在其實是承受過去代價的後果。

程：剛剛講到的台灣政府思維，政黨政治是否能造成什麼樣的差異？

姚：台灣政黨都不是左派政黨，他們都是右派政黨！不管是民進黨也好，台灣沒有左派政治，但有左派思維。

程：的確，關於政治，有一句話是這樣說：「我們只是從爛的裡面，挑出比較不爛的罷了。」但您認為這樣的現況有改善的可能嗎？

姚：因為台灣現在變成兩黨政治，而不是多黨政治。這樣子下去是不太健康的！變得只有正反面兩邊的意見，少了中間其他的聲音。電視上永遠看不到其他政黨的意見。長久下來，人們的思考就變成兩極化的思考。思考過程就會有很多情緒性跟無法解決的統獨問題，跟一些被貼標籤的可能。但我覺得第三部門，或是兩黨之外的政黨政治也許還有可能。

程：回到「海市蜃樓」，是什麼因素讓您開始發展這個計畫？

姚：因為我之前拍了很多廢墟，也會拍到很多蚊子館，其實我以前對蚊子館就滿有興趣，但是我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、也不知道在哪裡，而且一個人去拍可能要花很多時間，所以乾脆請學生一起來做。其實政府公部門的空間很多，只是他們不太會用，他們釋放出去的空间或土地都是BOT出去給財團。我對這點不太滿意，我覺得除了所謂BOT、OT或是ROT之外，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可能——非營利組織或是NGO組織也可以有營運的可能性。可是這個可能性很低，所以我做《海市蜃樓》有一部分是因為，台灣有很多空間都被政府拿去使用，卻效益不彰；不然就

是外包給財團去用，全部變成商業化空間。例如華山，以前我們在那邊做了很多實驗藝術，可是後來它完全商業化、產值化。台北有很多基地目前已經沒有實驗藝術的空間，政府一直高喊文創，但這所謂的文創就是把資金給企業，由企業做代理人，把通路打開，並生產或是促銷衍生性產品，很多閒置空間就被拿去做餐廳、咖啡館或是一些文創商店，可是藝術家還是缺乏創作的空間啊！如果一直在喊文創，卻沒有後面的研究室、工作室跟研究單位的話，要怎麼去談文創？到頭來可能只變成一個舶來品窗口。所以為什麼這些大園區都會推什麼小叮噹啊、Hello Kitty？因為那些都是外國套裝的東西直接進來，他只要付權利金，不需要自己去開發、長期去培養自己的人，那太花時間，而且回收太低了。他直接找小叮噹或是找夢工廠、宮崎駿來就搞定了！在哪裡展都一樣，你就收門票嘛！他們演完就走了。你說這對文創業有什麼幫助嗎？只對票房有幫助吧！所以那時候我們呼籲政府，要把一些閒置空間釋放出來給慈善機構、社會福利團體、藝文工作室，以及邊緣的弱勢族群。

政府現在其實慢慢有在做啦！所以他們釋放出一些給托兒所、一些慈善機構、合宜住宅……全台灣這些機構都很缺空間，所以這個計畫也間接讓這些需要空間的機構可以去跟政府商量空間。

程：所以這個計畫就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就對了。

姚：我們並不是公務人員，也不是立法委員，所以我們是比較客觀的去描述一個現實。我覺得能把一些資訊透明化，是我們能做到的：做一份資訊透明化的民間版清查。

程：在之前我跟您的E-mail往來中，您稱自己只是一個「多事的旁觀者」。您怎麼看待自己，跟這個計畫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？

姚：應該這樣說吧，連我們這種被社會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都可以這樣做，你說那些大學教授、社會系學者、政府官員，他們做不到嗎？一定都做不到！可能做得比我們好。可是他們為什麼不跳出來做呢？他們也月入數十萬呀，為什麼不跳出來做呢？我教這個課才月入4,800（笑）。所以我覺得，這個計畫也提供一個浪漫的想像——這種浪漫不是Romantic，是像以前德拉克洛瓦（Delacroix）「浪漫主義」的那種熱情——透過一些很不花錢，或說是很LOW的方式，照樣可以去燃燒對社會改造的熱情。我相信還有很多人都有這個條件去做，他們必須要被鼓舞、必須要有範例讓他們參照。連我都可以做，那很多人都可以做啊！我剛剛給出的10個問題，很多都可以做的啊！包括全台灣的空屋率調查。這很簡單，你就派一群人去蹲點拍照、去這些豪宅架相機，晚上的時候看燈會不會亮。就拍一個月，你就知道它是空屋。就可以算出來，這些都是炒房團在炒。政府是否要祭出空屋稅，或一些必要的措施，是需要證據與數據的。

程：剛剛老師講到計畫裡的一種「浪漫」，這是不是就是藝術參與公共議題，與其他專業不同的地方呢？

姚：的確是藝術比一般人想得還要（笑）……就是藝術的確是比較不切實際。可是也正是因為這樣，才敢做這樣的計畫！不然一般人誰敢做？得罪那麼多人、擋那麼多人的財路！我們是完全不管！其實我覺得出書後對各方面的幫助還滿大的，也沒有擋誰的路啦，很多案例也因為這本書而獲得了改善與活化的機會，以前政府也不太會撥錢進行活化，可是因為現在有專案，反而有機會進行改善。

其實我比較不會去想，藝術會不會真的去參與公共議題或改變什麼。我覺得是透過藝術比較活潑、具創造力的想像、以及一些剛剛說的……另外一種的解決方案，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思考。至於提出這個方案會不會被實踐或解決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但基本上還是可以讓人們對這樣的特定議題，產生不同的思考方向。

程：剛剛您談到了自我的角色，您覺得社會又會如何看待一個進行批判的藝術工作者呢？

姚：對於藝術，台灣社會是不太有興趣去了解的，而且還是停留在古典時期那種審美形式。這個計畫也讓大眾有了新的理解，其實藝術並不是存在於象牙塔，或是唯美形式而已，藝術是可以積極參與社會的。大眾對藝術家的形象也一直停留在梵谷那個年代，基本上時代已經差很遠了，早就不一樣了，所以我覺得社會大眾可以慢慢調整對於藝術家形象的認知（笑）。現在台灣有很多藝術家都在談論社會議題，他們提供了另外一層的思考模式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「藝術可以讓人重新思考」，這在思維上會有一些比較活潑的想法，而不是一直侷限在舊思維裡面。因為藝術從來都是一種偽科學，它不是科學，沒有辦法被驗證，或說是同理可證，或是求得一個具體的、正確的結果、答案——沒有！藝術的重點不是在求取數學般的解答，而是在於標準答案之外，還有甚麼可能性？如果是我們都直接選那個答案的話，那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數學就好了，可是在這個答案之外，還有很多可能性——藝術可以提供我們去思考那個可能性。

像上個禮拜我去綠島，發現好多蚊子館（笑），順道拍了幾個，哎……台灣社會其實已經慢慢步上日本後塵，整個經濟發展很快就要泡沫化了。你看現在房地產的現狀，大蕭條的時代應該快來臨了（笑）……現在年輕人畢業就是失業啊！薪資22K、28K，真的已經退化到我20年前，我以前剛畢業就是22K啊！真的都沒有前進。那這些錢到底都跑到哪裡去了？跑到大財團去了吧（笑），不然就是外流到中國了。

程：未來還會有類似這樣性質的計畫嗎？

姚：不一定耶！有時候要看機緣。比如說核能議題我就不知道怎麼發揮，因為我對這個議題比較沒有知識背景，這個蚊子館跟我之前的廢墟作品有關，所以比較容易切入。我關心的還是土地問題，所以最近內政部釋出900多筆土地，要轉給財政部去管理，我會再去了解一下，因為這些土地釋放出來一定都是給財團。出完第三本《海市蜃樓》，可能會再出一本閒置空間活化成功的專書給有關單位參考吧！

編者註

宋澤萊著的《廢墟台灣》是1985年由前衛出版社發行的長篇小說，內容是虛擬2010年的台灣因核電廠災變，一夕之間毀滅，變成無人的廢墟。

大埔事件：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的農民抗爭事件，起因為苗栗縣政府強制徵收農地。